

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

余南平

内容提要:本文以全球化理论认识和反全球化思潮为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层面的反全球化现象和政治思潮进行了动力、机制、认知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文章认为,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的转折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全球化红利”支付难题,已经导致民族国家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化;而社会底层运动的呼声,得到了西方部分政治代表人物的响应并推动着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念转换,这些都是影响反全球化的重要因素。传统西方左右翼政党的主流政治无法全面应对极右翼跨界联合的新挑战,从而在更深的文明层面引发了多层次的冲突与对抗,而这种社会认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扩散正在主导本轮反全球化的方向。

关键词:反全球化 政党政治 左右翼 文明冲突

引言

“全球化何去何从”?这是现阶段我们从各类媒体、学术文章和学术研讨会主题中看到的最热门、最具不确定性和最难以回答的一个方向性命题。尽管这个命题似乎有一个简单的主流答案,即全球化不会倒退。但从逻辑与学理角度来看,这个“不会倒退”的轻松回答,并没有指出和全面解释当下反全球化思潮与行动所对应的基本问题,也没有对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社会动力基础给予必要的合理解释,当然也就遑论对未来方向的全面把握。而在讨论反全球化现象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全球化的定义与概念。

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提出。他在1983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文章“全球化的市场”中提出:全球化一词被用以描述商品、服务、技术与资本在全球投资、生产及消费

领域的扩散状况。^① 作为商学院教授,莱维特显然早就敏感地注意到了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社会学学者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提出新的全球化认识维度,他认为“全球化是指世界上所有居民被整合进一个单一社会的过程”。^② 在阿尔布劳看来,如果要想在全球社会中共处,那么全球居民之间即使不能完全认同,但至少也应相互包容,有一套得到大家默许的社会规范。因此,他对全球社会共同规范有极大的期盼。

目前比较公认的对全球化比较规范的定义,是由著名全球化学者大卫·赫尔德等人在《全球大转型: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书中所界定的:“全球化是指社会关系与交易的空间组织的转变产生的跨大洲或跨地区的流动,可以从广度、密度、速度、影响等多种维度来衡量。”同样,在该书中,赫尔德这样解释道:“全球化一定是作用在一个地方、国家,或者地区的连续体上。一方面,这个连续体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是基于地方或国家的,而另一方面,这种关系网络也在更宽广的层面上为全球范围内的互动所塑造。”^③很显然,在赫尔德的眼中,全球化是网络关系,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双重互动塑造的。

因此,简单回顾全球化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进程和学术认识,我们可以认为,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轮迅猛的全球化,固然有其深厚的历史动因,特别是国际政治结构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原因,如苏东剧变、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发展中国家共同拥抱全球市场等等,但从更全面的动力和机制角度看,正如赫尔德等人早就判断的那样,除了国家层面针对全球化的政治互动和合力推动外,还有经济与社会层面全球化的深层次嵌入。而这种分层次、网络型的深层次嵌入,在很大程度上恰与全球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资本流动和新技术扩散高度关联。因此,当我们讨论今天反全球化的思潮与行动时,就必须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层次切入,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再思考。

一 经济层面的反全球化

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动力,来自全球经济大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还包括多边贸易协定和区域单一货币创造(欧元)等。这些国家间的互动在过去几十年间为积极推动全球化创造了制度空间,而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与构

^① Theodore Levitt, “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Issue May, 1983.

^② Martin Albrow,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40.

^③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5-16.

建,既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也是经济全球化能够落地的助推器。因此,研究经济层面的反全球化,就需要从全球产业链结构、宏观经济理论认识和国家政策行动等几个层面分别进行观察。

(一)经济层面全球化的事实与问题

如何识别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是从全球贸易总量的增长,还是从跨国投资总量的持续增加来判断?要认定过去20年间全球化加速的事实,其实并不困难。许多研究一体化效应和区域多边贸易框架的文献表明,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加速了全球资本流动并刺激了贸易的增长。但如果我们选择产业集中度视角分析全球化的实质效果,可能会发现更有说服力的事实。

首先,我们来看产业经济学理论层面的全球化。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Heckscher-Ohlin model),还有日本独创的“雁行发展理论”,哈佛大学雷蒙·佛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所公认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人们从产业视角观察到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跨越了几百年。但以国际学术界目前最为关注并在不断深入研究的“全球价值链理论”而言,根据美国杜克大学格里芬(Gereffi)等人自1995年开始的持续研究,全球价值链(GVC)可以被简单定义为“跨全球边界与地理空间的,从概念到最终产品的生产与服务的全过程链接”。在分类上,格里芬综合他人研究,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为五种,按照协调和力量不均衡程度,由低至高分别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等级型。^①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中,格里芬等人始终采用的是“领导型公司”(Lead Firm)和“整合性公司”(Integrated Firm)这两个概念,它所对应的含义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构建和形成中,跨国公司作为主角,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②另外,来自欧盟的研究结论显示,在2000-2011年的十年间,就全球经济体角度而言,美国出口中国外创造的增加值从10.6%上升到14.9%,欧元区从16.4%增至21.2%,中国从17.3%增至21.8%,日本则从8.5%增至17%;就欧元区内部而言,2011年德国通过欧元区内出口贸易获得了28.8%的增加值,法国仅有14.8%,而意大利则为12.2%,欧元区内贸易以德国对所有国家全顺差形式和对欧盟全顺差形式体现。而在制造业方面,以1995年的资本、高技术劳动力、中

^① 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2, No.1, 2005, pp.5-11.

^② 相关研究参见 http://www.cgcc.duke.edu/pdfs/2011-05-31_GVC_analysis_a_primer.pdf,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7.

等技术劳动力和低技术劳动力所占增加值构成与 2008 年相比,1995 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是 65860 亿美元,2008 年是 86840 亿美元,总额在十三年间提高了 2.1 万亿美元,但从增加值构成来看,在十三年的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增加值提高了 6.5%,高技术劳动力提高了 1.5%,中等技术劳动力下降了 4.2%,低技术劳动力下降了 3.8%。^① 因此,如果以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上述客观数据进行全方位分析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1) 发达国家出口中国外创造的价值明显增加,意味着全球化中留存本国的增加值在下降,对应的也是本土就业的减少;(2) 在欧元区 and 欧盟的一体化过程中,在双边贸易框架内,德国作为较多全球“领导型公司”的拥有者,在国家宏观经济层面上表现为巨大的贸易顺差和经济的强劲增长,在公司层面上,则表现为德国公司获得了来自欧盟与欧元区内消费者贡献的更多利润;(3) 以全球增加值分配角度而言,资本家是本轮全球化过程中的最大赢家,高技术劳动力获得有限,而中等技术与低技术劳动力是最大的输家。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全球跨国公司作为“领导型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包括强大的资本运作,在快速推进的全球化中不断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仅贡献了法律意义上“合理”的本国税收,或在投资东道国应尽的税收义务,不可能全方位支付“全球化红利税”。^② 另一方面,许多竞争力弱的民族国家,除了获得由外国投资带来的有限就业与全球平均税收外,^③ 还要应对大量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诉求,特别是西方传统发达国家普遍面临老龄化问题,由此产生了跨国公司是赢家而民族国家是输家的“资本全球化”的尴尬局面。^④

其次,我们从产业聚集视角来观察全球化。根据全球著名经济研究机构彼得森(PHIE)2017 年的一项实证分析,以全球 100 强公司为样本来看,在 2008-2016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恢复阶段,老牌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进入全球 100 强的企业数量都在不同程度地减少,其中英法两国分别从 10 家锐减为 3 家、9 家锐减为 4 家;德国的数量较为稳定,仅减少 1 家,数量为 8 家;加拿大减少 1 家,数量为 3 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进入 100 强的企业数量从 2008 年的 6 家猛增至 2016 年的

^① 有关研究参见 <https://www.esri.ie/pubs/JACB201530.pdf>, 2017 年 8 月 10 日访问。

^② 许多跨国公司为了合理避税,采用离岸公司注册纳税手段避开母国高税收,如爱尔兰、瑞士就扮演了“税收天堂”角色,同时为了吸收外国资本,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采用“税收优惠”作为手段,吸引外资。因此,跨国公司获得了全球化中最大的利益,但却没有支付社会福利成本。

^③ 所谓全球平均税收,是指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税收竞争”,许多发展中国家除了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外,通常也利用税收优势吸引外国投资,而发达国家中部分国家(爱尔兰、瑞士等)也将税收作为工具进行全球竞争,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出将美国公司所得税由 35% 下调到 15% 的“税改计划”就是全球税收竞争的极好注释。

^④ 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推动的“帝国版图扩张式”全球化不同的是,本轮全球化是在互联网技术扩散、全球运输与物流成本下降、全球资本流动加快等多因素聚集效应下,由跨国投资和全球贸易便利化推动的全球化。跨国公司是全球化主角,但却缺乏早年“帝国全球化模式下”的帝国体制内统一转移支付机制。

15家,美国从29家增至39家,日本和韩国各增加一家。这表明,在全球竞争中,中国力量快速上升,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转移。从产业集中角度看,无论是以行业前四还是前十的公司集中度,包括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的产业集中指标来衡量,这九年来,全球行业龙头企业的集中度均出现了下降,其稳定度同时降低。这表明,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低速恢复阶段,全球产业竞争更加激烈,全球化资源配置成为一种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①如果说,产业集中度还不足以体现跨国公司在当今全球化中的影响力和盈利能力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福布斯》杂志和IMF给出的数据进行综合比较。以2015年全球跨国大公司营收额和全球国家GDP进行对比的话,全球单体公司营收额最大的零售巨头沃尔玛2015年营业额为4858亿美元,超过了泰国(4127亿美元)、南非(4021亿美元)、奥地利(3937亿美元)等国的GDP,并与波兰(4967亿美元)、挪威(5010亿美元)、比利时(5111亿美元)的水平接近。考虑到沃尔玛在全球仅雇用了230万员工,作为美国本土最大的雇主公司也才仅有150万雇员,一年税前利润200亿美元,那么相比南非的5170万人口和泰国的6300万人口,跨国巨头沃尔玛的效率惊人。如果将沃尔玛、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英国BP、德国大众集团、日本丰田、佳能、苹果、三星、伯克希尔·哈撒韦十个全球营收额最大的公司进行累计,那么可以发现其营收总额高达29667亿美元,分别超过了法国(25656亿美元)和英国(25320亿美元)等欧洲大国的GDP。从现金储备角度看,苹果作为全球最大的现金储备公司,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其现金储备为2460亿美元,而2015年美国前50家大公司持有现金近1.5万亿美元,这个规模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一半。^②因此,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导致了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无论从营收的规模增长、利润总额的获得,还是现金储备,均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由此产生了著名的“皮凯蒂现象”^③。

(二)经济理论层面对于反全球化的认识

理论层面对于全球化与全球市场化结果的认识,并不是发端于此次金融危机前后,而起始于20世纪著名的人类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波兰尼认为,追溯19世纪西方文明时代的崩溃根源和历史断裂,经济自由

^① <https://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wp17-3.pdf>,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7.

^② 文中数据采用IMF官方数据、《福布斯》杂志年度排行数据与美国上市公司官方网站数据自行综合计算。

^③ “皮凯蒂现象”是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名字命名,是指工资收入增长持续远低于资本盈利增长的现象。法国经济学托马斯·皮凯蒂2014年出版了近700页的巨幅学术著作,研究了18世纪以来的财富数据分析结果,指出了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现象,具体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主义不仅是罪魁祸首,同时其本身也是乌托邦式的幻觉。同时,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社会还会导致两种类型的病症,它们并不能依靠自身的机制治愈。第一种病症可以被描述为“社会分化”(social disintegration),它是指国家与市场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在西方普选权下,会转换成政治民主与商业寡头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第二种病症可以被称为“伦理碎片化”(ethical fragmentation),它是指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道德贫乏的社会,高度理性的社会环境将人们的行为“无根化”。卡尔·波兰尼言辞激烈地写道:“要是让市场机制成为控制人类命运和自然环境的唯一力量的话——其结果将是毁灭整个社会……如果人类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他们将因此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逐渐消亡;他们将作为尖锐的社会分裂的牺牲品而死去……自然将被其组成要素所肢解。”^①

波兰尼的见地无疑是深刻的,虽然他并未给出自己提出的“社会保护”的终极实现方案,也未阐明如何在制度层面上完成“市场嵌入社会”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操作方法。但波兰尼的敏锐与洞察力,已经使其从人类学和历史而非经济理论角度来看待20世纪全球化中市场动力机制所带来的威胁与灾难。而他对于全球化可能性后果的分析与判断是如此清晰和具有前瞻性,以至于其经典论断“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一种新的、巨大的冒险即全球相互依赖最终形成”,成为最早的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警世名言。^②

在快速全球化启动的2000年前后(以欧元诞生作为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加速为标志),许多有远见的学者开始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现象,并开始提示并重温波兰尼早年的论证与观点,如约翰·格雷这样的学者和政治家、著名的全球投资人乔治·索罗斯,甚至还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经济学家。^③但是,这些警惕的声音在当时还不是学术界主流,也不被政治家所重视,更无法对抗全球范围内资本流动的强大力量。除了在每年全球性峰会的抗议者口号中,我们能够看到反全球化的零星呼声外,在国际政治经济视野中,没有人像波兰尼那样关心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甚至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人们还是始终把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于市场的监管不力。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出台了厚达2300页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期望通过市场管制来解决资本流

^①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p.76.

^② 对卡尔·波兰尼学术思想评述参见[英]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焦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③ 约翰·格雷曾经担任撒切尔夫人的私人顾问,后因撒切尔夫人推动全球化下的私有化计划而与其决裂,著有《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想》,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动和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问题;而在欧洲,欧盟的一系列应对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也是在坚持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框架下,强调国家的财政纪律与预算约束原则,并没有注意到在欧洲一体化中,由于国民性和文化差异以及宗教习惯影响下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问题,甚至故意回避这个差异性带来问题的无解性。^①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迅猛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包括多数民族国家促进公平增长的能力下降等问题,似乎并不在主流学术界视野之中,学界也缺乏当年类似约翰·格雷那样的质疑声音。更重要的是,当全球化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运用的推动下更加普及的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卡尔·波兰尼当年的提醒和对于全球市场化失控的强烈批判。^②

(三) 国家经济行动层面的反全球化

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设置,可以被视为国家层面的经济反全球化的典型做法。虽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们听到和看到的几乎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滋生”的新闻报道,但是通过客观数据进行认真分析并进行历史对比发现,自“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1995-2015年间,以反倾销(anti-dumping)发起为例,来自WTO成员方出口商发起的反倾销动议一共4987起(如果计算到2016年6月30日则为5132起),除了2001年有372起,2002年有311起外,其余年份均在200起左右,数量没有很大的变化,其中2011年仅为165起,除了印度比较集中使用反倾销发起手段外,欧盟与美国虽然是反倾销发起的大户,但2010年美国仅有3起(最多的2015年有42起),欧盟2013年仅为4起(最多的1999年有65起),没有充分证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出现了特别集中的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而且在数据排列上也未显示持续显著的反倾销上升趋势。^③因此,在WTO框架下,过去十年间在国家层面,即国与国贸易总体还是沿着贸易开放、关税降低的路径在发展,虽然WTO“多哈回合”谈判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包括区域贸易投资协定(RTAs)谈判却如火如荼。2014年全球新签的双边贸易协定

^① 笔者认为,欧洲一体化框架下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事实上与一体化带来的福利趋同两者并存,是欧债危机无解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而言,民族国家的存在使得欧盟范围内全方位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得不可能,有关论述可参见余南平:“欧债危机的福利趋同解释”,《同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② 互联网经济导致了典型的“贝加尔湖”效应,大型灵长类动物型公司如苹果、谷歌年复合增长率远高于普通小型公司,产生了资源与现金的聚合效应,不仅降低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能力,同时也加速了经济不平等,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足够关注。

^③ 笔者根据数据统计自行计算,数据采用WTO官方数据,具体参见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_InitiationsByRepMem.pdf, 2017年8月10日访问。

为 20 个,全球超过 110 个国家参与了 22 个区域一体化谈判进程。^① 因此,从数据对比来看,过去几十年间的经济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直观认识和新闻误导。那么,真正的经济反全球化是以何种国家行为作为标识和起点?

笔者认为,经济反全球化的转折点是 2016 年英国的脱欧公投。2017 年 1 月 17 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演讲清楚地表明,英国并不是寻求保持政治与主权独立,而是寻求脱离欧盟的经济框架,并与欧盟重新签订新的双边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不仅意味着英国政治上寻求独立和经济上反全球化的“硬脱欧”开始,同时也是一个主权国家放弃一体化框架下的经济利益的标识。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的竞选许诺以及就职后的实质性行动,再一次将国家层面的反全球化推向新的高度。特朗普在就职后的第三天立刻签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总统令,不仅是对奥巴马政府耗时 5 年推动贸易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努力的全面否定,同时也是美国在国家层面发展区域一体化框架下的贸易与投资全球化的一个重大转向。特朗普在否决 TPP 协定的同时,还表示 1994 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要重新谈判。而此前,美国许多学者对 TPP 为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带来的益处进行了大量研究。^② 这些学术研究显然并不为特朗普政府看重。而为了改善美国就业,采取更保守的办法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增强美国单方面利益,才是这一届美国政府的选择。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与需求总量最大的国家——美国明确选择了国家层面的反全球化行为,背离了过去十几年甚至二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经济与贸易全球化原则,转而以“美国优先”为政策取向,并确定了以双边替代多边,包括采取单方面贸易行动的政策原则。^③

二 社会层面的反全球化

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指出的那样,是指全球居民被整合进入全球单一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居民通过交往或是文化融合逐渐产生社会

① 笔者根据有关数据自行统计,数据来源:<http://rtais.wto.org/UI/PublicAllRRTAList.aspx>, 2017 年 8 月 10 日访问。

② 彼得森研究所(PIIE)在过去几年间对 TPP 进行了持续追踪研究,并在 2016 年发布长达 136 页的研究报告,具体内容参见 <https://piie.com/bookstore/trans-pacific-partnership-assessment>, 2017 年 8 月 10 日访问。

③ 美国贸易代表处 2017 年 3 月 1 日发表的《2017 年贸易议程与 2016 年年度报告》清楚地显示了美国贸易的转向,并明确提出要以双边而不是多边来重新处理美国与外部的贸易关系,这可以被确认为明确的贸易反全球化举动,具体报告参见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17/AnnualReport/AnnualReport2017.pdf>, 2017 年 8 月 10 日访问。

认同,并渐进改造社会意识。因而,讨论社会层面的反全球化,需要关注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特征和社会运动轨迹。

(一) 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全球化

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全球化,是全球社会层面的反全球化认识和观点的统称,或者称之为反全球化民粹主义运动意识形态。过去十年间,全球呈现出一个非常怪异的景象。传统上,拉美民粹主义在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以强烈的拉美左翼意识形态出现,但这种以阶级划分认识与认同的左翼意识形态,随着这些国家持续的经济失败逐渐退化,其民粹主义基因中占主导的平等和阶级斗争意识,似乎随着拉美国家的经济衰落而消亡。^①如果把巴西作为案例剖析,那么从总统罗拉在位期间的治理方式到首位女总统罗塞夫被弹劾的全过程,似乎看不到“拉美左派”参与式民主意识形态的影响,“革命、民主、民族”既不再是鼓舞人心的代名词,也不再是连接社会普罗大众汇聚意识形态共识的纽带;^②而在亚洲这个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早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地区,不仅全面缺席民粹主义运动,而且在韩国这样曾有过激进民粹主义运动历史的国家,也仅在朴槿惠“闺蜜门”事件中,才能看到要求司法公正的民众共识(如果可称之为一种民粹主义意识的话);相反,在欧洲,这个看起来在战后已经建立起完整民主制度,按照有效政党组织原则运转的大陆,不仅民粹主义意识广泛增长,而且在不断地发酵和进入公共政治领域,甚至在民粹主义运动消声很久的美国,也出现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并在政治空间与话语空间中不断生长的情况。^③

解构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全球化,一方面需要探究社会层面反全球化议题的核心内涵;另一方面则需要理解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思维导向。而这两个问题事实上都与欧洲著名学者达伦多夫提出的“达伦多夫困惑”密切相关。欧盟委员会经济与金融总司的两位高级官员为了解答“达伦多夫困惑”,引用了欧洲社会融入监测报告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从统计分析角度提出:工人阶级和低技能领导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威胁,而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者则是全球化的拥护者,传统主义者无

① 在按表现形式判断激进与否的排名中,拉美左翼意识形态表达形式的激烈程度远高于欧洲极右翼政党,在全球22个国家分级评级中,委内瑞拉得分最高,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其次,欧洲范围内瑞士排名最高。虽然英国有著名的英国独立党,但其排名倒数第四,甚至不及瑞典和比利时;美国没有出现在排名表中。具体实证分析研究参见 https://populism.byu.edu/SiteAssets/Hawkins_Silva_Provo_January.25.pdf, 2017年8月10日访问。

② 传统上拉美左翼政党是以阶级认识来反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欧洲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治理方式的一个变种和延续,是外国资本主义对本国工人和底层民众的侵略行为。

③ 《时代》杂志以专栏文章形式讨论了跨大西洋的民粹主义意识增长问题,具体参见 <http://time.com/time-person-of-the-year-populism/>, 2017年8月10日访问。

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均对全球化保持警惕。^①同样,我们也可以基于访谈结果提出同样的疑问,为什么在欧洲与美国参与当下民粹主义运动的主体,是以中老年为主、受过普通教育、从事低端劳动,并且有着较为明确西方宗教信仰的白人团体?^②当下欧美的民粹主义运动与种族特别是与宗教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新闻记者丹·桑切斯(Dan Sanchez)在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FEE)网站上发表了评论文章“班农相信寒冬将至”,非常透彻地展示了这个易被忽略的视角。这篇文章的插图将班农装扮成一个远古战士(身披铠甲、手持利剑)。在文中,桑切斯指出:班农认为“历史有循环逻辑,每个周期大约持续80年,今天美国历史正在经历第四个回合,它意味着一次规模性战争,其规模不会小于二次大战,而这场战争目前正处在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全球战争的开始阶段……回顾犹太-基督教西方反伊斯兰教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祖先坚持住了立场,把它抵挡在这个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图尔……”。班农的言论,在桑切斯看来正是米塞斯称之为“战争社会学”的底层哲学,这种哲学的逻辑是,除非牺牲掉另一方,否则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好处。在“零和”世界体系中,对立群体之间利益不可调和。在历史上,这种情景在左翼意识形态中体现为阶级斗争和身份政治,而在右翼意识形态中则是文化战争与民族主义。冷战结束后,在福山曾经断言的“历史的终结”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带动的新一轮全球化运动,使我们全然忽视和淡忘了民族、文化、宗教等宏大议题本身具有的内在张力和潜在的对抗元素。在社会意识层面,近些年我们所熟悉的名词是“全球市场、自由贸易、气候变化、黑科技、恐怖主义”等流行词汇。全球社会就像一部结构精准的机器,在全球资本注入和跨国流动中,不断地进行技术、服务、产品的创新。直至今日,我们才在美国、欧洲逐渐显现的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中,发现了反全球化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端倪。这个反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诉求,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19世纪到20世纪民族国家独立性与帝国疆土维护之间的争夺对抗,而更可能是人类社会中具有更久远历史传统的以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撑的文明对抗和文明冲突。我们完全可以借用米塞斯的逻辑,将当下社会意识层面的反全球化观念总结为:由于宗教

^① 所谓“达伦多夫困惑”是著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在20年前讨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时提出的困惑,即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整合体如何能够保证社会团结和政治自由的存在?如果不能,达伦多夫则预言必然是新的威权主义崛起,具体研究参见<http://voxeu.org/article/european-integration-and-populism-addressing-dahrendorfs-quandary>,2017年8月10日访问。

^② 笔者2016年9月在美国内华达和德州访谈了12位司机,其中有6位白人男性司机(占白人男性司机的100%)对移民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并支持特朗普参加竞选。包括支持英国独立党的人群结构统计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特别是2017年8月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爆发的骚乱,更是凸显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行为和观念。

分歧与生活习惯将全球社会垂直割裂,而文明碰撞与经济竞争将全球社会横向割裂,全球社会意识形态再次从共识中分裂,并以自我理解的文明为基础进行碎片化后的再整合,甚至以冲突方式寻求矛盾的解决。

(二)新社会运动与反全球化

社会运动的规模性形成与持续,源自剧烈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冲突加剧。社会运动可以是自发、非系统组织的,如在过去十年间全球性峰会召开期间各类非政府组织的零星主题性抗议示威,包括反全球化人士的自动聚集和跨国联合行动。^①但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如果要获得更大的成功,并对政治产生影响,那么政党的有效组织与广泛宣传可能必不可少,同时灵魂人物的存在也至关重要。上个世纪欧洲的纳粹主义运动即是佐证。然而,本轮社会运动的反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完全遵循上个世纪人们习惯的大规模底层社会运动的轨迹,而是呈现了广泛的多元化表现形式。总体上可分成三种模式:一是德国的“精英式”主题运动模式,其主要是针对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发出现的新的精英式政党和简单诉求的社会运动。^②德国选择党(AFD)在德国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精英反对欧元一体化,包括对欧债危机的救援方式的精英式思维诉求的反映,其发起人和领导人汉堡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一个学者型社会精英,其党员主要构成也不是社会中的低层群体,而是以社会精英为主,其支持率从2013年成立以来持续上升,说明越来越多的德国精英对反一体化与移民进行了深入思考;^③二是法国的“半精英式”不稳定社会运动模式。以让-玛丽·勒庞为首的反移民、反欧元一体化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构建的社会运动模式,从1972年开始已经有了四十年的历史,观察其历史上支持者的构成与投票支持率的变化,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无论投票率高低,其党员和支持者的构成始终是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而没有新的社会成员加入,这些稳定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构成了国民阵线的“半精英”模式。研究其支持率变化的高点与低点,则更富有解释和分析价值。2007年的法国大选正处于全球金融危

^① 最典型的全球性社会抗议运动是2010年多伦多G20峰会期间爆发的抗议活动与引发的骚乱,而2011年爆发的“占领运动”则更可以被视为反全球化、反不公平结果的全球性联合抗议活动,参与抗议的人群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持续时间长达1个月。具体报道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Occupy_movement, 2017年8月10日访问。

^② 对比研究德国纳粹主义大规模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当年参与纳粹主义运动的人群构成,主要是中低受教育水平和中低社会阶层人员,同时纳粹主义运动有全面的政治、社会、文化、种族治理理念和系统性观点。而今天德国选择党的社会运动诉求主题相对单一,缺乏全面性与系统性。

^③ 关于德国选择党的政治诉求与德国主流政党的分歧,参见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学者的研究,<http://www.gmfus.org/publications/countering-right-wing-populism>;关于德国选择党的情况和发展,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ternative_for_Germany, 2017年8月10日访问。

机爆发之前,也就是全球经济泡沫膨胀期和蜜月期,法国国民阵线的投票支持率下降到4.3%。这个结果固然可归因于萨科奇成功的竞选战略,以及法国左右翼联合对极右的警惕因素影响。但从经济投票理论角度看,在膨胀的经济中,人们关心的是眼下的利益,而非持续捍卫政党初衷和价值理念,其参与者立足于社会运动认识层面而非精英党员的政治理念诉求。2017年法国大选前的民调显示,2017年3月底国民阵线的支持率猛升到26%,这是该党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高支持率,其所对应的社会背景,就是欧洲经济艰难恢复与欧洲难民问题叠加,从而导致法国社会对经济问题和移民问题的认识转向,更多的人是从社会情景和社会氛围来选择支持某个政党;^①三是美国的“反对建制派式”社会运动模式。美国茶党的“反建制”社会运动经历了三个典型阶段:在茶党1.0阶段,2009年2月,即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后的一个月,茶党发起全国性聚会的初始阶段,该党的社会运动主题是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明显带有历史上美国茶党“抗税”的思维痕迹,这是一种自发的来自社会中下层特别是拥有传统价值观者的运动与呼声;在茶党的2.0阶段,也就是2011年和2013年茶党运动爆发阶段,其主题是“政府债务危机”与“政府停摆”,期间伴随着国会中民主党与共和党就预算问题展开的激烈辩论和重大分歧,茶党作为社会运动,在外围全过程呼应了两党的辩论和博弈;最后是茶党3.0阶段,其的主题突然转向了更具文化与文明特征的“移民问题”,并迎合了美国大选中的“反建制”潮流,在这一阶段,茶党支持者明确将主题固定为“反对移民文化带来的多元化”。而当茶党的持续社会运动遇上特朗普参与2016年美国大选后,一切就发生了改变,茶党运动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运动,其诉求与反建制派政治家实现了无缝结合,并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因此,茶党的社会运动模式,可被视为非固定主题的反建制运动,由经济、政治问题向文明冲突进行了渐进式演化,并在特定环境下成为政治成功的典范。^②

三 政治层面的反全球化

政治层面的全球化推力,一般取决于全球政治主导大国和主要参与国家对全球化中政治合作的态度、认识与行动。而判断反全球化同样也要从国家层面的政治行动和政治结构变化角度进行分析。

^① 有关法国国民阵线的得票分析统计,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Front_\(France\)](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Front_(France)), 2017年8月10日访问。

^② 有关茶党的研究,包括其民粹主义和反穆斯林特征分析以及茶党与特朗普政治观的融合研究,参见 <http://www.otheringandbelonging.org/trump-the-tea-party-the-republicans-and-the-other/>, 2017年8月10日访问。

(一) 英国脱欧能否被视为政治反全球化的转折点

英国脱欧是否是国家层面反全球化的转折点? 这个问题肯定会引发争论并有不同的答案。

首先,英国历史上曾经历过脱欧公投。1975年的那场英国公投,以微弱多数组阁的工党威尔逊政府的公投诉求可以简单表述为:给英国人民一个展示其权利的机会,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利益,包括欧共体的农业政策与预算分配。^①而这个场景与1964年欧洲著名的“空椅子危机”的剧情一样,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撤回参加布鲁塞尔欧共体理事会会议的法国代表团的行动,其动机是维护法国在欧共体中的经济利益。而从解决方案而言,核心焦点仍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英国与欧共体重新谈判的主要目标,在1974年12月的巴黎峰会和1975年3月的都柏林欧共体理事会上达成,欧共体各成员国就预算修正机制、允许新西兰乳制品进入和定价许可达成了一致。英国首相威尔逊认为,政府已经“将我们的决定带到了共同体的谈判桌上,就成员国而言,谈判已经足够深入”。^②接下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1975年3月18日,在威尔逊正式向下院阐述谈判结果后,民调马上出现变化。而在随后举行的6月5日公投中,英国以压倒性优势选择留在欧盟。反观2016年的英国公投准备,可追溯至2011年12月的欧盟峰会上,英国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以法德为首提出的修改《里斯本条约》的动议,迫使除英国和捷克之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在欧盟条约框架之外签署了政府间性质的“财政契约”。这个转折点可视为英国对欧盟应对“欧债危机”处理方式的不满,更可以视为英国对自身政治主权的一种坚决捍卫。随后于2013年1月,卡梅伦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布隆伯格演讲(Bloomberg Speech),阐明了政府希望欧盟进行条约改革的四个领域:第一,不参与政治一体化的所谓“更紧密的联盟”,加大国家议会在欧盟立法中的权力,不能脱离民众做决定;第二,欧元区一体化必须对欧元区国家和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第三,停止依靠移民福利政策吸引其他欧盟国家公民来英国工作;第四,需要保持竞争力、工作机会、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成功。^③很显然,这些主张遭到了法国、德国的拖延式反对。而早在2012年,英国的多次民调就显示,保守党中要求退出欧盟的比例高达68%。^④历史上保守党存在因某些问题几乎

^① Harold Wilson, “Let Us Work Together—Labour’s Way Out of the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Resources*, <http://www.politicsresources.net/area/uk/man/lab74feb.htm>,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7.

^② “Hansard 1803–2005”, EEC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HC Deb 12 March 1975, Vol. 888, cc509–22,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75/mar/12/eec-european-council-meeting>,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7.

^③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eu-speech-at-bloomberg>, last accessed on 14 November 2016.

^④ Daniel Boffey, “Four out of 10 Lib Dem Voters Inclined to Leave EU—Poll”,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2/nov/17/lib-dem-voters-eu-poll>,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7.

造成党内分裂的先例,如果卡梅伦坚持不对其欧盟立场进行明确表态,很可能危及他的支持率,并且造成保守党内部分裂。在2013年卡梅伦演讲发表后,保守党内部达到了空前团结,不管是支持欧洲、怀疑欧洲,还是反对欧洲的派别都支持卡梅伦的明确表态。事实上,在英国,当时的政治进程设计已经确定,只待欧盟的反应。理论上,欧盟有三年的时间和无数次谈判机会,包括到最后时刻妥协都有机会挽留英国,但德国、法国的拖延,或者说“建制派精英”的傲慢,导致欧盟最终没有拿出实际的行动方案。所以,与1975年不同的是,2016年英国公投的主题不是欧盟国家传统上的经济利益问题,而是一个欧盟国家对欧盟政治一体化框架的认同和立场问题。公投是在一种明确的政治选择倾向下展开的,是英国反对欧盟与反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一体化的选择。

其次,从政治参与和政治组织来看,英国保守党右翼虽然是2016年公投的主角,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UKIP)的支持率由2010年的3.1%增至12.6%,并在2014年欧洲议会直选中获得了27.5%的支持率,而其在欧洲一体化鼎盛时期,也就是欧元创建并开始流通使用的2001年,仅有1.5%的支持率。^①另外从投票结果来看,2016年6月29日英国公投后进行的数据分析显示,支持脱欧的投票者主要是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给英国独立党的群体,包括未获得大学学位者、60岁以上的老人、面临就业竞争压力的低端行业劳动者等。

民意测验专家阿什克罗夫特在英国公选后也再次进行了大样本民调。^②民调结果显示,脱欧投票群体主张的最大理由是“应该坚持由英国做出自己决定的原则”,而留欧群体则主张“考虑到经济、工作机会和价格因素,投票给脱欧的风险似乎太大了”。同时,退、留欧投票群体还在诸如多元文化、社会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互联网发展等问题上持相反观点。另外,在英国公投结束后的2016年10月,由沃威克大学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再次证实,自2004年欧盟扩大后,有100万移民从中东欧进入英国,占英国工作人口的3%,低收入移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出现,才是影响本次英国公投结果的关键因素,也是英国反欧洲化的主导因素。^③因此,综合分析投票结果和实证研究后,不难发现,本次英国公投脱欧是由右翼政党发起并主导,且得到全社会弱势

^① 有关英国独立党的成长历史,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K_Independence_Party,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7。

^② Lord Ashcroft, “How the United Kingdom Voted on Thursday... and Why”, Lord Ashcroft Polls, 24 June 2016, <http://lordashcroftpolls.com/2016/06/how-the-united-kingdom-voted-and-why/>,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7。

^③ 具体研究参见 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economics/research/centres/cage/manage/publications/306-2016_becker_fetzer.pdf, 2017年8月10日访问。

群体附和与赞同的一次“联合行动”,其主要分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投票”,也不是传统左右翼政党关于社会政策开放与保守的争辩,而是在政治、移民、文化、女权问题上见解的彻底不同,选民也出现了跨越政党界线的“左右共识和联合”,比如下层劳工就站在脱欧派一边。在民粹主义导致的左右共识问题上,美国杨百翰大学哈金斯和欧洲中央大学的席尔瓦,对全球 22 个国家的样本进行了数量化的分级研究,其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理念不仅对社会传统右翼群体有影响力,同时也平衡、均匀地在左翼和右翼群体间传播。^①

英国的公投结果^②释放了一个不祥的信号,欧盟作为战后人类历史最高水平的“政治一体化”组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一体化历程后,出现了内部松动和作用降低。而这恰恰发生在许多欧洲政治和经济学者著书撰文,将欧盟应对“欧洲债务危机”不利的原因归咎于缺乏“政治共识”,并呼吁加强欧盟和欧元区“高政治”领域合作之时。^③可能也有观点和分析会将英国脱欧视为欧洲范围内特有的“反一体化”现象,并以“区域一体化”的概念与视角解释英国脱欧问题。但我们不能无视的问题是,如果将历史上罗马帝国的行省管理制度,特别是帝国法律的普遍适用,看成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治一体化的标识特征之一的話,那么在今天欧盟范围内,欧盟的法律在各国的嵌入与适用也同样证明,在欧盟框架内存在实质性的政治一体化。欧盟政治治理形式和模式,就是全球化政治治理的一种区域性特殊表现,或者说是更高层级的表现。因此,在逻辑层面上,当我们将英国脱欧看成当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结果时,就可以完全解释让-玛丽·勒庞统率的持更激进主张的国民阵线在法国支持率持续上升的事实;^④当然同样也可以解释,从欧盟地区政策中受惠的中东欧国家(主要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强烈批评和拒绝,并称坚守欧洲文化与文明价值;还可以解释荷兰作为传统欧盟中坚力量和开放性国家,其极右翼的反伊斯兰政党荷兰自由党的力量不断增强。

因此,当我们把英国公投脱欧结果置于整个欧洲政治运动的视野下,并关注在欧

^① 在研究民粹主义导致的左右共识问题上,哈金斯(Kirk Hawkins)和席尔瓦(Bruno Silva)两位学者的具体研究参见 https://populism.byu.edu/SiteAssets/Hawkins_Silva_Provo_January.25.pdf,2017年8月10日访问。

^②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投票率高达72.2%,高于2015年英国大选的62.2%,高于1975年脱离欧共体公投的64%,仅低于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的84.6%。这个投票率很难用缺乏代表性来笼统解释。

^③ 2016年5月,一批欧洲著名的学者在著名研究智库CEPR上发表了电子出版物,讨论加强欧元区政治合作以保护开放社会。具体参见 <http://voxeu.org/content/reinforcing-eurozone-and-protecting-open-society>,2017年8月10日访问。

^④ 2017年法国大选,“非左非右”的马克龙虽然当选,延续了法国中左右翼协力对抗极右的政治传统,但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得票增加,已经在某些层面极大地改变了法国原有的政治生态。

洲传统意义上的左右翼选民中出现的“问题式”联合与认同^①时发现,随着政治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累积和矛盾增加,传统的“政治正确”因素正在逐步消失。一种新的以保卫自身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的保守政治理念正在崛起。无论是被简单形容为“民粹主义”,还是被描述为政治极右思潮抬头,这种反全球化的政治思潮突破了传统政治左右翼政策认识的界限,瓦解了传统的政党动员与组织结构,并以“文明生存”为口号在逐步形成政治动员力量,而英国脱欧不过是其一种有影响力的表现形式而已。

(二) 政治人物的政治哲学认识中的反全球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政治家托尼·布莱尔依据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后,^②整个欧洲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都缺乏新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和治理理论突破。选民并不在乎那些居高位的欧洲政治家主张什么,事实上他们也难有打动选民的新观点和新思想。人们更关心的具体问题是,德国在欧债危机中能够做什么? 是否能够给予更多的救援资金? 在救援政策实施上,德国这个“金主”能否宽恕南欧国家的过度福利行为? 因此,欧债危机以后上台或是还在继续执政的欧洲政治家们和政党,无论是左派的法国社会党,还是右派的德国基民盟,在执政的政治理念方面似乎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分歧,其目的就是维护欧盟这驾“轮毂松散”的马车不要翻车,以保证车上的人不至于跌入深渊。

在英国,法拉奇所领导的英国独立党支持率近年来不断上升;在荷兰,极右的自由党领导人威尔德斯的反伊斯兰政治主张正在获得更多的认同,但这些欧洲的民粹主义政治家,似乎也只有口号与行动目标,缺乏明确系统的政治理论的支持,正如法拉奇在成功启动英国脱欧进程后,面对脱欧投票结果却不知道如何开始走下一步。对他们而言,这种缺乏持续政治理念和清晰政治逻辑的僵局将如何破解? 直到美国 2016 年大选结果公布后,政治研究者才比较确定,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政治家们给出了答案。他们不仅在大选中谴责了建制派政治家“政治正确”的代价与其所面对的问题,同时在取得选民的相当程度的认同时,也提出了完整且清晰无误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另类新保守主义”的话。^③

事实上,只要阅读特朗普在 2015 年出版的《美国再伟大》这本书并分析其深层内

^① 所谓“问题式”联合与认同,是指选民们关心的是投票的主题,而不是政党理念和政策主张,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投票中,左右翼政党选民可以就某一具体问题达成共识和认同。

^② 有关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论述,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是美国的传统政治主题,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开创性地使用了“情景保守主义”这个名词,以强调出现外来挑战和威胁时,美国保守主义者就会作出激烈反应。

涵,就可以发现,它不仅是特朗普的竞选说辞和执政纲领,同时也隐含着特朗普对约翰·罗尔斯所谓“政治自由主义认定民主文化之理性多元化的事实”的强烈抨击和反感。^① 特朗普在书中不仅猛烈抨击了伊朗核协定,而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表达了强烈的开战决心。通过特朗普核心团队人物的言论及其著作,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场已经开始的政治反全球化的思想脉络。以已经辞职的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为例,在2016年7月出版的《战场:我们如何赢得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盟友的全球战争》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我们正处在一场世界大战中,以对抗罪恶人群自居救世主的大规模运动,他们中大多数人受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煽动”。如果说弗林的将军身份使得这本书的学术分量不足的话,那么请注意这本书的合作者,正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保守主义斗士迈克尔·林登(Michael Ledeen)。他在过去几年内不仅连续为新保守主义杂志《新共和》撰写文章,同时作为一个专业学者也对伊朗问题、伊斯兰与西方文明冲突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② 同样以特朗普的竞选搭档、新当选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为例,在2017年2月召开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他不仅与另一著名的右派人士——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同台出席,而且在演讲中坚定地宣称:“我们组建了无与伦比的保守派内阁,以色列的奋斗就是我们的奋斗,以色列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以色列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③由此可见,新一代的“另类新保守主义”运动经历了近十年的蛰伏,已经在理论基础和政治人物培养上完成了相应的准备。他们主导下的政治反全球化目标,就是清除过去自由主义与建制派在政治全球化和“政治正确”理论指导下的所有“错误”。他们的行动目标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卫西方文明,阻止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其政治哲学基础就是确信文明的冲突与竞争是天然存在的,是制度、文化、习惯、传统、宗教自然的对抗。如果说特朗普、彭斯、班农、弗林等人的某些明确目标,是指文明的冲突与对抗的话,那么在美国沉默许久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战略家罗伯特·卡根,则在2017年2月6日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中,延续其一贯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立场,并将这种可能的冲突引向了“修正主义大国”,并声称“全球正向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倒退”。根据罗伯特·卡根的主张,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过程中的大国政治合作与治理共识,以及美国的任何实质性让步,均

① Donald J. Trump, *Great Again: How to Fix Our Crippled America*, Threshold Editions, Reprint Edition, 2015.

② Michael Flynn and Michael Ledeen, *The Field of Fight: How We Can Win the Global War Against Radical Islam and Its Allies*, St. Martin's Press, 2016.

③ <http://fortune.com/2017/02/23/cpac-bannon-pence-conservative-unity/>, last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7.

不能换来安全承诺与利益交换,反而会助长“修正主义大国”攫取世界舞台权力的野心。^①

因此,我们在讨论本轮政治反全球化之时,无论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无论其逻辑依据是否合理,包括其主张是否正确,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这种政治反全球化主张在美国已经具有了初步的政治行动,并形成了一群立场鲜明的政治代表人物。^② 他们能否号召并影响更多的人聚焦在“政治保守主义”与“西方文明捍卫者”的旗帜下? 我们无法马上清晰地回答。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西洋两岸的反全球化政治理念在特定氛围下的一定程度上的互动。虽然其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这种非主流的政治反全球化力量再凝聚现象较之过去十年无疑更为明显了。^③

四 结语

透视上述三个层面的反全球化现象,我们可以发现,本轮国家层面反全球化的经济行动、政治思潮与政党运动以及社会运动,既不是由个别政治人物发起的一国现象,也不是单纯的国家经济利益诉求。相反,当下的反全球化思潮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过去几十年间快速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问题的一次“集体性反思”。反全球化主题也由传统国家层面和社会群体层面的经济利益得失转向政治层面,以及文明与文化冲突的纵深层面,而且预示着全球不同文明的竞争与对抗在特定环境下的显性化和表面化。在经济层面,全球经济治理缺乏“全球化红利”转移支付体系的存在;在社会层面,文明与文化冲突的张力增加;在政治层面,标志性、领导性的政治人物不断出现。这一切使得本轮反全球化以多层面、多维度的立体方式展开。虽然我们尚不能预测反全球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将这种反全球化的转向称为民粹主义全球化,还是文明直接碰撞的结果,全球政治发展与运作轨迹在西方国家明显

^① 卡根的文章参见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2/06/backing-into-world-war-iii-russia-china-trump-obama/>, 2017年8月10日访问。

^② 政治反全球化不象经济反全球化那样能够精确定义,特朗普虽然提出了某些政治反全球化主张并有所行动,比如在2017年5月结束的G7首脑峰会上,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未就全球气候变暖达成共识。但毕竟美国自认为是全球领导型国家,因此,在国家利益层面上的全球合作,包括与其他世界大国进行务实的双边合作,也是特朗普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同时,特朗普政府内部结构的变化,如弗林辞职、班农退出等,会导致政治平衡与政治哲学导向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③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对于欧洲范围内的极右翼民粹主义现象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系统性分析,相关研究参见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ipa/10756.pdf>, 2017年8月10日访问。

向“更右”的方向发展,并且得到了来自底层民众的积极响应与反馈。^①

很显然,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拉美式民粹主义运动不同,特朗普的“限穆令”和废除TPP,勒庞的“反移民”导向和退出欧元区主张,荷兰威尔德斯对穆斯林的敌对与议会席位的扩大,还有匈牙利欧尔班的“保卫西方文明”的造墙举措……这些正在世界各国发生的政策转向与社会政治运动呼声,都具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即彻底废除过去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政治家的“政治正确”导向,并以民族和自我文化认同,包括文明习惯保护为立场,以使自身族类和社会免受全球化过程中的所谓“文明污染”。这种反全球化的政治导向与政治哲学认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着20世纪30年代极端主义运动的痕迹,也突破了过去几十年间西方政党理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左派”与政治“右派”认知体系。^②

在目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公共政治辩论和公民投票的主题不是选择大政府与小政府,也不是争论公共开支预算大与小,更不是回答社会政策是否更多向妇女与儿童等传统议题倾斜,而是需要政治家与选民更清楚与坚定地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如何认识世界”,以及“谁是我们的敌人”……这类问题是本源的、植根于文明和文化习惯的“高意识形态”问题。的确,在今天的反全球化思潮下,政治领域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识上的西方政党“左右”政治选择所面对的问题。西方政党传统右派与传统左派一样,似乎均不能解答“达伦多夫困惑”,也提不出全球化过程中已经“碎片化”的社会如何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③因此,当主流政治无法面对与解决问题的时候,一个来自文明层面的认识分歧和竞争以及对抗力量的再凝聚,也就潜移默化地主导了当前反全球化的进程。

(作者简介: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17年3月2日的民调显示,对于特朗普就职后首次在国会发表的演讲,57%的被调查者认为演讲非常正面,比较正面的是21%,而负面的仅为21%;调查同样显示,认为特朗普将带领国家转向正确方向的人为69%,认为错误的是26%,认为特朗普将带领国家“向右”转的人,在演讲前是58%,而演讲后上升为69%。该民调显示,选举前后激烈的反特朗普运动,不仅在美国得到了平息,同时美国社会逐步开始认可特朗普的各项政策举措,并认为国家方向正在向右转变。

^② 英国著名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者蒙莎拉特·吉尔伯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警告说,目前激进的极右翼政党有着明显的反穆斯林和反非白人移民倾向,他们不希望通过法西斯体制和个人独裁来改变现行政治制度,但正在通过民族主义的共识来跨越左右界线,并克服传统左右的政治分裂。无视这种挑战,未来的主流政治可能会被取代。具体研究参见 <http://www.policy-network.net/uploadedFiles/Publications/Publications/Migration%20and%20the%20rise%20of%20the%20far%20right.pdf>, 2017年8月10日访问。

^③ 作为传统的中左翼政党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注意到了目前主流政治对于极右翼回击不力的问题,并认为传统的回应与妖魔化极右翼均是无效的,主流政治要成功应对,就必须回答选民的焦虑与担忧。具体研究可见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ipa/10756.pdf>, 2017年8月10日访问。